



讀《天生的凡夫俗子 ——蔡文甫自傳》

國立政治大學中文學系學生

黃亦凡



天生的凡夫俗子—
蔡文甫自傳
蔡文甫著
九歌出版社 / 9010/360 元
ISBN 9575608283/ 精裝

從事過軍職、作家、教職、記者、副刊主編，直到現在成爲臺灣出版重鎮——九歌出版社——的經營者。蔡文甫，創辦九歌一系列文化出版事業（如九歌文學書屋、健行文化公司、天培文化公司等）以及九歌文教基金會，曾迭獲金鼎獎、大韓民國文學獎、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、榮譽文藝獎章。他憑著不屈的精神，立定志向，站穩腳跟，在大時代的逆境裡，從無到有，從離鄉背井的難民到成功卓越的出版鉅子，爲平凡的生命創造不凡的願景。本書的創作，是蔡文甫檢視自己的奮鬥歷程，苦澀的童年、困頓的青春、創作路上的甘與苦、事業經營的有所爲與有所不爲，皆真真實實地呈現在裡頭，並見證了 60 到 90 年代文學的變革、社會的變遷，以小見大，爲時代做佐證。

蔡文甫所以會想寫作這本書，主要是源自於朋友的鼓勵，他們認爲蔡文甫一生橫跨不同領域工作，穿越多層時光網路，耳聞目睹親身經歷了種種際遇，必然有著許多難得的體驗，若發而爲文，必然能啓迪不少的讀

者，亦可爲人生旅程補白。但，最大的動力還是在於他讀了沈君山的《浮生三記》一書，讓他覺得自己恰好與沈君山相反，一生挫折連連，一路頂著逆風行駛，只有六七分才能，藉由努力而勉強做七八分事。他也不像其他的傳記主角有各種特殊的天賦才能，或是異於常人的不凡際遇，故稱自己爲「天生的凡夫俗子」。但由於被捲入了大時代的激流裡，爲時勢所迫，而遍嚐了人生中種種酸甜苦辣，更顯得其向逆境奮戰不懈的歷練更難得可貴。

本書分爲五章。第一章主要敘述他青年時期在大陸上的生活。他出生在江蘇，家中貧苦，但由於他大哥天培的關係，促使他上學讀書，之後雖時讀時輟，但他喜歡讀書，渴望能早日回到學校。第二章敘寫他離鄉背井，隨軍撤退到臺灣，直到離開軍營爲止。在軍旅生涯中開始寫作，第一篇小說〈希望〉也發表於中華副刊上，這件事加強了他寫作的興趣，也影響了他後半生的努力方向，開啓了他的作家之路。第三章是講述他在教學方面與創作一齊發揮。他在中華文藝函授學校服務，不但在寫作方面獲益不少，也認識了不少重要作家如王敬義、楚茹、盧克彰等作家。此時進展到與名家並列的創作期。

第四章記錄了他如何成爲中華副刊主編、策劃梁實秋文學獎，以及兩度獲頒金鼎獎的過程。他認爲一個報紙副刊所要帶給人們的，應該不只是娛樂而已它博君一笑或是輕鬆柔美之餘，也應該兼顧智識，尤其是與生



活不可分割的一種反映，與讀者不可分割的一種連結。在擔任中華副刊主編之時，推出多個專欄，向許多知名作家（如薩孟武、梁實秋、錢思亮、王夢鷗、朱炎、王大閔、漢寶德、隱地等）邀稿，並將精彩的內容、作品集結成書而出版。詩人焦桐也是從大一開始就投稿到中華日報副刊，他認為蔡文甫用心經營副刊版面，使其雜誌化、版面素雅又乾淨，在中國時報以及聯合報壟斷副刊之時，中華日報像副刊像是文學傳統的第三勢力，蔡文甫為臺灣傳播寫下重要的一個記錄。

第五章談及了蔡文甫如何創辦九歌出版社、挑戰出版高難度作品、出版有特別意義的書、以及成立了其他分支機構的經過。當初蔡文甫並沒有打算創立一個出版社的計畫，是其好友王鼎鈞先生熱心鼓勵支持，不但借款給他，並特地為他寫作一本新書讓九歌出版，而爾雅出版社也願意代理發行，使得九歌出版社從王鼎鈞的一句話「你（指蔡文甫）結識了不少作家，為何不辦一家出版社？」到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」的情形下具體誕生了。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校長龔鵬程認為九歌的風格平淡素雅，不論是不是重要的作家，風格都相當一致，而蔡文甫並不像一般出版人重視經營管理，他的經營方式一直是價值、意義導向的，他也以文學教育為職志，出了相當多的好書，也致力於兒童文學。

為維持出版品質，除了竭力爭取有內容有深度之名家精品，同時積極發掘有潛力之年輕作家，如早期的陳幸蕙、林清玄、蕭颯、吳鳴等，近期的張啓疆、吳明益、朱少麟、鍾怡雯、凌明玉、張瀛太、郝譽翔等，而且為以「不出書」馳名的張繼高，運用剪稿的方式，剪稿十年獲得其首肯而出版《必須贏的人》系列三書。九歌亦出版了一套《中華現代文學大系》，展現臺灣近二十年來文學發展大勢，亦為臺灣文學界的一大盛事。為回饋社會，民國81年成立九歌文教基金會，舉辦兒童文學獎、小說寫作班、文

學研討會等，也頗有建樹。

蔡文甫的作品在《文學雜誌》及《現代文學》一直出現，曾被認為是臺大外文系畢業，但，蔡文甫幾乎沒受過正式教育，都靠自學而來，寫作則是參加函授班。中研院文哲所副研究員李爽學表示，蔡文甫的作品很有現代派的味道，和一般五〇、六〇年代的作家不同，蔡文甫的不是反共文學，而是用文學的技巧看臺灣的社會。王鼎鈞認為蔡文甫的文筆質樸，結構嚴密，是他一貫的特色。穆欣引高爾基的話：「文學的任務，藝術的任務究竟是什麼？就是把人品格上最好的，優美的，誠實的，也就是高貴的東西，用顏色、字句、聲音、形式表現出來。」穆欣認為我們今天正處在一個人心糜爛的時代，所以文藝確然要負起重振社會倫理的責任。我們不是一位文藝道德家，更不是文學功利主義者。但是當社會真正面臨道德、倫理的崩潰時，不得不要文藝發揮一些影響力，使人類真正有一個希望的明天。蔡文甫的作品可能正好發揮這方面的功能。事實上他所主持的出版社所出版的作品，大多數也是基於此一理念出發的。

從事出版23年的蔡文甫，更是位成功的出版家，人曾稱他為「蔡九棟」、「蔡半街」，現稱「蔡半城」（指他擁有房屋的棟數），關於這些稱呼，在書後也提到：只求住得舒適、方便，毫無身價可言。而近百萬本書需歸類、儲存，還要有配合進庫、退書的運轉空間。於是以華廈的等值購買了寬廣的書庫……。這顯出九歌在出版界重大的地位。蔡文甫談到二十餘年出版生涯的最大感動，一來自讀者：「有時候一本書可以銷到一萬兩萬冊，甚至三、五萬冊，這麼多愛書人實在令人感動。」二來自作家：「他們與九歌原來是主客關係，但後來往往成為好朋友，越來越親、越信任。」蔡文甫與九歌出版社的確是結合當代文化、架構作者與讀者的橋樑——誠如他自己在中華副刊上所期許自己的一樣。